

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 (1939-1942)

林映汝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隨著政治體制從帝制走向共和，再加上西方史學的衝擊，民國以後的史館到底呈現如何的面貌，乃從較為穩定發展的國史館籌備委員會著手，並以該會總幹事朱希祖為線索，希望能對此問題有更多的認識。研究發現，該會係由朱希祖於1939年初所撰〈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一文間接催生。文中一方面點出在中日戰爭背景下，需要藉由國史書寫以強化抗日精神，同時主張國史和黨史要有所分別；另一方面則關照到學界在西方史學影響下已知設立檔案庫的重要性，故符合時代及學術的雙重需要。在黨史會擬轉型為國史史料機關不成後，藉由「國史」名義蒐集戰時褒揚人物事蹟，凝聚國族意識的必要性更形凸顯，籌委會乃於1939年底通過設立。在朱希祖的規劃下，籌備檔案庫成為該會工作的一部分；人才進用方面則相對強調專業性和學術性；在史館制度設計上，亦以配合當前國家體制為考量。故此一時期的史館，不僅多了民族國家的色彩，更在朱氏的推動下，有了西方國家檔案館的角色，且試圖朝向專業化發展。

關鍵詞：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檔案總庫、朱希祖、張繼、但燾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Zhu Xizu and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1939-1942

Ying-ru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how the state-funded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ion of China evolved as the country moved from a monarchy to a republic an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rrived. The office for compiling Official History began to develop steadily after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was established in 1939.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growth of this Committe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ommittee's crucial figure, Director-General Zhu Xizu.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itial idea of founding the Committee was inspired by Zhu's article, 'The Proposal for Establishing National Archives and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written in early 1939. In the article, Zhu advoca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wartime spiri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through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In addition, Zhu argued, such efforts would well reflect China's increasing recognition, influenced b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f the importance of archival preservation.

The need to preserve the records of citizens who received the government's Honors and Awards in wartime, and to enhan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became a more urgent issue when the attempt to transform the Party's History Council into a state-owned agency failed. In response, at the end of 1939, the format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was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approved.

Under Zhu's planning, the project of archives preparation became part of the Committee's mission. The Committee also recruited talents, to be employed by the project, with a relative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criteria. Lastly, the design of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was brought in line with the system of a modern state.

As a result of these measures,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ad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the country's traditional Official History offices. It not only reflected the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but to some extent functioned like national archive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also tried to move towards specialization.

**Keywords: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ion,
National Archives, Zhu Xi-zu, Zhang Ji, Dan Tao**

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 (1939-1942)*

林映汝**

壹、前言

相對於古代中國，民國以後的史館，主要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是政治體制已從帝制進入共和，史館頓失長期賴以生存的土壤；二是新史學取代舊史學，在西方史學的衝擊下，傳統史學節節敗退。¹ 因此，進入民國之後，史館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惟史館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隨著中國從「天下」走向現代民族國家，² 加上在「新史學」的影響下，其性質究竟有何轉變？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如何的作用？或仍值得探討。

* 本文曾在2019年2月22日，於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群、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共同主辦之「百變民國：1940年代之中國」青年學者論壇中宣讀。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9年8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10月17日。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¹ 勞榦曾分析國史路線動盪的原因，認為其一是政治上由專制到共和，修史失去了中心問題；其二是中國國史本有傳統的軌道，但民國以來，講新史法的人對舊史多所批評。見勞榦，〈論今後的國史〉，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年），頁1152。

² 此處借用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增訂初版）一書的書名。

雖然1912年胡漢民等人呈請設置國史院時，得到臨時大總統孫文的贊同，³不過，等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將各項官制咨送北京臨時參議院審議之後，就有參議員在國史館官制案的討論上，認為共和時代不應成立具有君主專制色彩的國史館，且恐國史出於少數一二人之手，而非本於公論，因此出現不少反對聲浪。⁴

另一方面，當梁啟超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後，傳統「正史」的地位已大受打擊，後來甚至在疑古的風氣下，出現「不看二十四史」的現象。⁵又在梁氏的〈新史學〉之後，中國史學已經趨「新」轉「西」，造成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和王朝為中心的興亡記載，或者以政治、道德和倫理鑒戒為中心的歷史敘述，無論在最激進還是最保守的學者中，都漸漸被揚棄，挾「科學」而來的西方史學思路則取得了全面的話語權。⁶再者，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史學逐步走上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特別是1930年代以後出現標準化的趨勢，建立了學術專業化的指標，也使整個撰述的重心亦從官方轉移到了私家。⁷於是，受到重視的是學院中學者專家的研究和著述，而所謂「官修史書」的地位則相對顯得尷尬。不過即便如此，進入民國以後，史館仍未消失。

³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年），頁3-5。

⁴ 例如參議員梁孝肅一開始就提出國史館官制案可以作廢，不應開二讀會。其理由有三：一、國史應自由修纂，不能定為官修；二、國史可由教育部修纂，不應另立官制；三、國史之修纂，應本全國人民之是非判斷，非一二人之意思所可修纂者。並指出，以前所有歷史，大半係皇室家譜，與國民關係至為鮮少，中華民國之國史若仍由政府設官修纂，則仍必蹈專制時代之覆轍，重政府而略國民。又陳同熙也認為國史館官制不可設，亦無庸設：「何言不可設也，中國此日是共和國家，非君主國家。君主國家設史官以編纂君主一人一家之言，若共和國家而設立史官，恐必蹈於君主國之故轍。」「如現在之事實，由官修纂不公之輿論，則過去與未來者，均可以不公諸輿論，民國之謂何乎。」見「參議院第八十六次會議速記錄」，收入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三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頁324-325。

⁵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收入氏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84-88。

⁶ 葛兆光，〈《新史學》之後—1929年的中國歷史學界〉，《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2003年2月），頁86。

⁷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頁505-512；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316。

北京臨時參議院雖然對國史館官制案有諸多反對的聲音，但是最後仍然獲得通過。⁸王闓運赴任國史館館長後，國史館即於1914年5月25日成立。惟至1917年，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呈請大總統黎元洪將國史館暫行停辦，以節經費，由教育部派員接收。之後，併入北京大學文科附設國史編纂處。兩年後，又因係學校附設機關，不足以昭鄭重，改歸國務院辦理。1927年，張作霖再以大元帥名義明令國史編纂處改設國史館。不久，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北京政府國史館乃告結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雖一再有設置國史館的提議，但僅有1931年由行政院擬定了「國史館籌備處組織規程」。1934年，行政院與內政、教育、財政三部雖會商擬訂國史館組織法草案，但其附帶建議以為應先設立直隸於行政院之國立檔案庫。逮至國民政府西遷重慶，1940年始成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積極展開籌備工作，並於1947年，於南京正式設立國史館。⁹之後，雖因1949年中央政府遷臺而中斷，但1957年在臺復館後，又持續發展迄今。因此，可以說，民國以後的史館在幾經周折後，至籌委會時期才較為穩定開展。故本文擬從該會入手，探討何以其成立之後，能相對順利運作。其中，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朱希祖（1879-1944）從撰寫〈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史館議〉開始，到籌委會正式成立後出任總幹事一職，堪稱是該會的靈魂人物。他如何定位民國以後的史館、安排史館的工作；如果說史館被視為傳統史學的代表，當史學逐漸成為專門的學科，在傳統和現代史學之間，他又如何調和或取捨等問題亦引發筆者興趣。爰本文擬從他1939年受邀撰寫議案開始探討，到1942年他從顧問轉任名譽顧問，淡出籌委會結束，並及於他對史館規劃的落實情形。

目前有關民國時期國史館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提及籌委會，但對於朱希祖

⁸ 贊成設置國史館的意見，如臨時參議員谷鍾秀指出：「大家心目中，已先有一皇帝之影響，故以為國史所頌揚者，不過皇帝。現在設官修史，以為亦必與前相同。不知從前係專制時代，一切作用，皆為專制之作用；現在既為共和時代，則一切作用，必為共和之作用。」其次，設立國史館並非限制民間不准修史，有國史館不但不礙於私史且可為私史之參考。又曹玉德認為，現在民國成立，不比專制時代，可以控制文字書寫；民國言論著作，均講自由，國史有不能達到之處，私人亦可以著述，不用因為是官方修史，而有曲舉之虞。「參議院第八十六次會議速記錄」、「參議院第九十五次會議速記錄」，收入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三冊，頁324、326-327、499。

⁹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3-5、31-34、43-44、69-70、76、83-94、119-124、143。

在其中發揮的影響，或未著墨，¹⁰ 或顯得簡略，¹¹ 餘則因研究角度的關係，側重在籌委會的檔案業務或朱希祖個人的史學成就。如吳宇凡從檔案學史角度，對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進行研究，雖詳細描述該會所進行之檔案徵集、檔案總庫籌備、檔案整理辦法制定等工作，但未提及朱希祖。¹² 又如王愛衛在其《朱希祖史學研究》一書中，利用當時尚未出版的朱希祖日記，探討朱氏擔任籌委會總幹事的始末及其對史館制度規劃、舉薦人才的方式與標準，以及對國史體例的見解，¹³ 惟未再更多地闡釋其工作對籌委會的意義。

本文主要利用朱希祖的日記和文集、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中有關國史館沿革等資料進行撰寫。盼能經由探討朱希祖對史館的規劃與實踐過程，呈現其時史館的面貌與性質，並對民國以來官方史學的發展情形做一些補白工作。

貳、撰寫〈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

朱希祖身為學者、大學教授，因與張繼（1882-1947）有所交往，故有機會將其想法表達出來，形成政治決策的參考與依據，他先寫出〈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後來且幾乎一字不漏地成為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的提案，此一提案雖一時未能順利實現，卻成了催生籌委會的基礎。而提案的內容不僅表現朱氏的史學思想，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當時的時代環境與學術氛圍。

¹⁰ 最早任職於籌委會的蔣逸雪在其所寫之〈三十年來國史館籌備始末記〉一文中，列有籌委會的組織大綱、徵集史料簡則等。見蔣逸雪，〈三十年來國史館籌備始末記〉，收入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編，《史蠡》（重慶：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42年），頁105-122。又許師慎所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一書，內容則以大事記的方式呈現，再輔以相關史料，其中收錄有成立籌委會的提案、籌備大綱、檔案保存辦法等。見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01-133。蔣、許之作皆屬記事性質，未見更多的申論。

¹¹ 如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13-21、28-30；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2月），頁121。

¹²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北：國史館，2019年），頁176-195。

¹³ 王愛衛，《朱希祖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20-132。

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設置國史館及檔案館的討論

無論是建立檔案總庫或是設置國史館，在朱希祖提出〈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之前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早已有不少呼聲，而且曾一度有以檔案庫取代國史館之勢。

關於設置國史館的提議，從北伐完成之後，就屢次被提出。如首都新聞記者聯合會等四個團體於1928年11月建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設立國史館，因「大懼中華民國光榮史實，湮沒弗彰，陷於共產黨徒抹殺歷史之謬誤，其何以息邪說、距僻行，而正人心」，請速派專員接收北平原有國史館之稿件。¹⁴ 之後，又有江蘇省政府主席鈕永建呈請設立國史館，主張孫文以其四十年革命精神，為民請命，宜有實錄；而追隨孫文之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等人亦應留有傳記；至於陳炯明等忘本背義，則應予口誅筆伐。¹⁵ 因此，斯時各方提出設立國史館，一方面有與共產黨爭奪歷史詮釋權之意，另一方面則是要肯定國民黨革命的正當性。至1929年，國民政府實施訓政之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邵元冲領銜在三屆一中全會上提出：鑒於本黨革命經過之事實，非特為精神寄託，亦民國演進之過程，黨事國事密不可分，應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設置「黨史編纂委員會」，整理革命史蹟，作為將來編修國史之準繩。次年，在名稱改為「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後，即通過組織大綱，正式成立。¹⁶ 於是，就在黨史亦相當於國史、以黨領政的訓政思維下，黨史會得早於國史館而成立。1931年，國民黨南京市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又提案以國史館是「繼續民族生命」、「發掘本黨精神」、「各國均有我國不能付諸闕如」、「免除檔案散佚而為搜集史實、發掘文化」的機關，要求中央函請國民政府迅即設立。¹⁷ 其中「發掘本黨

¹⁴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國民政府」（1928年11月19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222-00001-001。

¹⁵ 「江蘇省政府委員會主席鈕永建呈國民政府」（1928年11月27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1-003。

¹⁶ 陳鵬仁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上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頁2；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建立六十週年紀念》（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年），頁6-8。

¹⁷ 「國民黨中執會秘書處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31年4月2日），〈國史館沿革史

精神」，仍反映出國史與黨史界線的模糊。後來，此案雖然由行政院交內政、教育兩部進行籌備，並擬有「國史館籌備處組織規程」，¹⁸但最終仍未有任何結果。可以說，在黨史國史不分，又黨史會已先行成立的前提下，國史館成立的迫切性也因之削弱。

在黨史和國史的範圍尚未釐清之際，設立國史館抑或國立檔案庫的矛盾卻出現了。1934年1月，當黨史會主任委員邵元冲等人再度於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上提案重設國史館，由國民政府送交行政院討論時，行政院以「在現代潮流上，舊式國史館之意義，已甚微薄」；「有關國史史料之檔案，皆在整理研究之列，……各機關在行政與事業上，皆須隨時參考，斷不能集中一處」；「以現在國家之財力與人材而論，官撰新式國史尚非其時」等為由，建議：抄索史料以及整理可公開之檔案，應委託學術機關從事；應設立直隸於行政院之國立檔案庫，以保存國家文獻。¹⁹行政院基於設立國史館已不符合時代潮流，且檔案整理應在國史書寫之前，欲以檔案庫取而代之。之後，國民黨中常會決議依照行政院的建議辦理，該院並再約集中央研究院及教育、內政二部召開重設國史館案審查會，擬具辦法包括：由行政院於院內及內政、教育兩部、故宮博物院調派人員，並邀中央研究院參加，組織國立檔案庫籌備處，計劃庫房之建築，及保存儲藏與便利研究各事宜；由教育部通令設有近代中國史科目之各大學及學術機關充分注意近代史料之蒐集等。²⁰只是當籌備檔案庫章程送交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會研究後，認為應先成立檔案整理處，擬定整理檔案具體辦法，再著手建立檔案庫。因此，成立檔案庫的構想也未能立刻實現。²¹不過，經此之後，成立國史館不僅出現是否必要的問題，而其與檔案館及檔案整理工作之先後問題，也凸顯了出來。

（一）》，《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1-010。

¹⁸ 「行政院呈國民政府」（1931年7月13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1-013。

¹⁹ 「行政院函國民政府」（1934年3月13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1-017。

²⁰ 「行政院函國民政府」（1934年5月4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1-022。

²¹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頁130-131。

事實上，檔案的問題會在此時浮現，且成為國史館設置上的障礙，有其行政管理與學術上的背景。因為就在重設國史館議案提出之際，行政院正在推動由內政部次長甘乃光（1897-1956）所主導的行政效率研究館（後改稱「行政效率研究會」），初期並以文書檔案事務之研究為重點。²² 甘氏是美國芝加哥大學行政學家懷特（L. D. White）的學生，認為行政改革的目標在增加效率，如由文書檔案改革入手問題比較小、範圍與普遍性比較大，設立中央檔案庫將加速各方面的進步。²³ 因此，當時行政院正從行政改革層面出發，而觸及檔案管理問題。另外，根據參與重設國史館案審查會的行政院參事滕固提及：除了之前北方類似國史館的組織沒有什麼成績可言，在現代潮流上，此類組織之需要十分薄弱以外，剛巧當時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會也顧慮到檔案的保管和整理，於是把這兩方面的意見集合起來，就產生了設立檔案整理處的構想。又謂：「有了國家總檔案庫，蒐羅時間上較古而現行機關不恆取用的檔案，此在消極方面可補救獨立機關因堆積而損失的情事；在積極方面，替歷史學者設置了一所貴重的作場。」²⁴ 由此可知，行政院方面已認知到良好的檔案整理和保存方式不僅有助於行政工作，國家檔案庫的設立對歷史學者從事研究也相當重要。²⁵ 因此，當重設國史館的議案一提出，他們立刻察覺到，歷史書寫也需要利用檔案，其立於行政管理角度所提出建立檔案庫的構想，可先取代國史館。

事實上滕固之所以有此認識，不無受到德國史學的影響，他曾赴德留學，並獲得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²⁶ 他寫道：

²²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頁112-117。

²³ 甘乃光，〈甘序一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收入何魯成，《檔案管理與整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頁1-2、36。

²⁴ 滕固，〈檔案整理處的任務及其初步工作〉，收入滕固著，沈寧編，《被遺忘的存在：滕固文存》（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頁281-282。

²⁵ 曾任職於檔案整理處的何魯成也指出檔案之功用可分兩方面：一為供辦理文書之參考；一為備修史之用。何魯成，《檔案管理與整理》，頁7。

²⁶ 滕固（1901-1941），字若渠，1918年自上海圖畫美術學校畢業後，1920年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後，一度任教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及金陵大學等校。1928年棄教從政，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導委員、宣傳部長，不久被開除黨籍並遭通緝。1930年赴德國留學，專攻藝術史，1932年獲得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成為首位以藝術史學獲得此項學位的中國人。自1933年起，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滕固小

舊檔案即為未變面目之史料；其可貴之處，未被引用之檔案，在某程度內可視為新史料；已被輾轉引用之檔案可以原檔訂正後代所成史書的謬誤或缺略。……近世歷史學發達，保存檔案之舉，又開了一個新的局面。至今日各國首都，如巴黎之Archives Nationales，倫敦之Public Record Office，維也納之Haus Hof-und Staatsarchiv，柏林之Reichsarchiv等等，皆為國家檔案庫，著聲於世；……我以為吾國欲保持文物之邦的聲譽，國家檔案庫之設置，甚不容緩。²⁷

鑒於歐洲各國都設有檔案館，促成史學發達，並發揮保存的功能，使他認為檔案庫之設，不容再緩。而且，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意見，隨著留學西方的學人增加，檔案在歷史研究上的價值已逐漸為當時的史家所認識，設置檔案館的呼籲亦隨之而起。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建者傅斯年（1896-1950），他在留學德國時，受德國史學傳統，尤其是蘭克學派的影響，致力追求客觀、科學的史學，並且重視原始資料的蒐集。²⁸ 傅氏主張國家必設保存史料之機關，因為史料必賴國家之力保存整理，但是國史之成未必出於史官，良史之才不在官亦得施展。²⁹ 故當行政院第二度召開重設國史館審查會時，中研院由傅斯年代表出席，會議結論除提到邀請中研院參加國立檔案庫籌備處外，亦著重如何蒐集史料。姚從吾（1894-1970）曾與傅斯年一同在德國留學，並在柏林大學專攻歷史學方法論，認為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漢姆（Ernst Benheim，蘭克再傳弟子）的治史，有比較客觀的標準，「實高出乾嘉一等」。姚氏回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所開「史學方法導論」課程，就著重在介紹德國史學家治學方法，重視第一手史料。³⁰ 1934年，他應故宮文獻館邀請前往演講，即直指檔案館與現代歷史學的關係，謂：「檔案館對歷史學是供給原史料的大本營。」「現代的歷史學注重從『原史料』中找證據。而原史料

傳》，收入滕固著，沈寧編，《被遺忘的存在：滕固文存》，頁3-4。

²⁷ 滕固，〈舊檔案之保存與整理〉，收入滕固著，沈寧編，《被遺忘的存在：滕固文存》，頁276-277。

²⁸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77-78。

²⁹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頁161-162。

³⁰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臺北：著者自印，2000年），頁15-16、20-22。

供給地，就文字寫下來的史料說，最重要的就是檔案館。」³¹ 在姚氏看來，檔案對於研究歷史真相實具有無比的重要性，有了檔案館才能供給檔案。其他如曾赴歐遊學的羅家倫（1897-1969），也認為英國的Public Record Office是一種最好的制度，早在北伐軍進入北京時，他憂心各部檔案散失，就想過許多挽救辦法，並曾建議設立檔案保管局。³²

當時，不只留歐學人，早期留日、時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的孟森（1868-1938），也體認到檔案作為一種原始材料在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並理解政府以檔案館應優先於國史館設立的道理。他說：「國史不生於國史館，國史館則待有既成之國史原材而後下筆，此一定之理也。今聞人言政府不主張即設國史館，而謀設保管檔案之所，是即悟史有原材矣。」³³ 並指出：「將來設立國史館，非由各院為供給材料之機關不可。蓋史官係機械的，必須由國家供給史料，而後始可著手也。現在討論史職，是以外國及我國歷代相比較，足見檔案之重要，惜從前無人注意及之。」³⁴ 孟氏此言，不僅說明檔案為國史書寫所必須高度仰賴，亦為此後國史館之設，開出了需由各機關供予材料的必要條件。

從國史館設置的角度而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雖屢有提議，但在黨史、國史混為一談的情形下，因為黨史會已先行成立，也使得國史館的必要性相對減低了。另外，隨著檔案在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逐漸為人所了解，以及檔案館的概念從歐洲傳入，似可先取代國史館，也讓國史館的成立之路再度受阻。

二、朱希祖提議的背景及議案的內容

朱希祖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撰寫〈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一文，設

³¹ 姚從吾，〈檔案館與現代歷史學的關係〉，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會編輯，《文獻特刊》（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5年），頁39、52。

³²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二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年），頁58。

³³ 孟森，〈國史與國史館〉，《獨立評論》，第135號（1935年1月），頁15。

³⁴ 孟森，〈中國歷代史料之來源並擬現代可以收集之方法〉，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會編輯，《文獻特刊》，頁34。

立國史館及檔案庫的議題，再度被提出，在前此已有若干爭議的情形下，該文如何處理兩者的關係，並回應時代的要求？

朱希祖，字逖先，浙江海鹽人。1905年，赴日留學，就讀早稻田大學，研究歷史，並在此期間受業於章太炎（1869-1936）。朱希祖曾提到，師生兩人平日談論以史學為多，章氏治史以蒐集材料、考訂事實為基礎；以探索歷史哲學、指揮人事為歸宿，蒐集材料則為第一要義；並認為章氏對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之解讀即「六經皆史料」。³⁵ 在治史方面，朱氏受其師之影響及其領略和體悟可見一斑。

除師從章太炎，接受中國傳統學術的薰陶外，1920年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後，則「頗思以歐美新史學，改革中國舊史學」。不僅力主選派畢業生至德國留學，如考選姚從吾赴德專習歷史；又鼓勵教授翻譯新史學及唯物史觀等書，特別是請何炳松（1890-1946）翻譯美國史家魯賓遜（J. H. Robinson）的《新史學》一書；還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列為必修科目，「思以文學的史學，改為科學的史學」。³⁶ 在朱希祖的領導下，北大史學系逐步廓清史學範圍，使中國傳統的史學成為一門符合現代性質的學科，並進一步向社會科學轉化。³⁷ 事實上，隨著各種社會科學興起，使史學的獨立性面臨挑戰，西方史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而朱氏受到德國學者蘭布希特（Karl Lamprecht）的影響，即倡導以社會科學為歷史研究的基本科學。³⁸ 是以，朱氏之為學並不守舊，且亟欲汲取歐美的史學新思潮。

另外，在北大任教期間，朱希祖曾參加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接收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並指導史學系學生從事整理。之後，又獲聘為故宮文獻館史料審查委員會委員，³⁹ 並曾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編

³⁵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47-349。

³⁶ 朱希祖，〈北京大學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新史學》序〉，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頁329-330、375。

³⁷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頁123-124。

³⁸ 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期（1997年），頁272-273、279-280。

³⁹ 傅振倫，〈朱希祖先生傳〉，收入氏著，《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

刊業務。⁴⁰ 因此，在明清內閣大庫檔案逐漸受到重視之際，他有機會參與其事，對相關工作可謂並不陌生。

在從事學術及參與檔案整理工作之餘，朱希祖因其師章太炎的關係，和張繼有所交往，亦得參與黨政之事。由於參與革命，章太炎與張繼相識於日本，之後成為結拜兄弟。章氏於「蘇報案」出獄後赴日，時張繼為《民報》發行人，章氏則擔任主筆，並從事講學。⁴¹ 朱希祖即於此時入於章之門下，朱、張二人可能因此結識。1928年，張繼發起組織滿蒙新藏研究會，即聘請朱氏為名譽會員。⁴² 1934年，朱氏應聘為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就在要到南京赴任、途經上海時，適遇張繼於書店，並至其住處談學論藝。到南京不久，又往觀張繼之所藏。⁴³ 之後，兩人因章太炎的關係時相往來。⁴⁴ 1937年，時任黨史會主任委員的張繼委託朱希祖擬訂黨史編纂處搜集史料計畫書。⁴⁵ 不久，朱氏也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公函，將聘其為黨史會名譽纂修，不過朱氏以未加入國民黨擬不就職。⁴⁶ 至此，張繼遂因為職務的關係，進一步看重朱氏在史學方面的專長。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朱希祖隨中央大學遷住重慶。1938年12月31日，前往拜訪張繼，「暢談保存政府檔案事」，張繼乃請其作提案一篇，以備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⁴⁷ 朱氏翻閱《史官沿革》及《明代撰史成案》，檢尋《周禮》中保存政府文卷方法等，先撰成〈唐宋兩代修史成法成時政記〉一篇。⁴⁸ 1939年1月13日，清華大學史學系畢業、曾受業於朱氏、甫從英國留學歸國、新

年），頁605；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頁99、167-170、321-323。

⁴⁰ 周文玖，〈朱希祖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4期（2013年12月），頁47。

⁴¹ 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頁5-8。

⁴² 朱元曙、朱樂川，《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74。

⁴³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12-314。

⁴⁴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648-649、671、688-689。

⁴⁵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753。1937年3月3日，朱希祖即代張繼擬了〈黨史徵集史料編纂史籍計畫書〉。參見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766。

⁴⁶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789。

⁴⁷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970。

⁴⁸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972、974。

聘至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的周培智（1902-1981）來談英國保存檔案方法。據周氏云，英國檔案分兩層辦法：其一是可以發表的，則撰成詳細報告書，印成藍皮書，以供大眾閱覽，可當作歷史材料；其二是須守秘密、不可以發表的，大部分由外交部保存於地下室，內閣也有，保存方法亦同。對此，朱氏自記：「當局既不注重歷史，故亦不注重檔案。此次遷都避難，外交部檔案遺失甚多，國府圖書館保存之《清實錄》及重要史料亦未遷出，淪為敵有，……。史料淪亡，史館虛設。將淪為無歷史之民族，可哀孰甚？」⁴⁹自1月17日始，即擬〈保存檔案備修國史建議案〉，後改題為〈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22日將文稿交予張繼。⁵⁰27日，張繼、吳敬恆、鄒魯等13人就在五中全會上提出「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案」。⁵¹

〈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一開始就提到：「中國國史不可自吾黨而絕，猶中國國祚不可自吾黨而亡。」在中日戰爭的烽火下，亡國的危機感逼近，國史與民族存亡的關係被連結了起來，甚至「亡史之罪，甚於亡國」，因為「國亡而歷史不亡，則自有復國之日」，故國史有延續的必要性。又謂：「自滅者，蔑棄史料，不修國史」；「人滅者，尊重史料，常修國史，雖為敵國禁燬，而終者副本流傳，不可終滅」，尤其國家檔案為「史料之淵海」、「國家之根底」，所以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設檔案總庫。另外，文中指出，建國以來，對南北政府檔案，不甚重視，散佚不少。又抗戰以來，設陪都於重慶，倉皇播遷之時，國府以及各部會檔案聞亦有散佚棄去者，淪陷區之省府檔案，更無論矣。⁵²是以，該文認為，隨著中日戰爭的展開，為了維繫民族精神，必須成立國史館；同時要

⁴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975。朱希祖相當關心檔案、史料的保存工作，他在〈《滇南碑傳集》敘〉中言：「中華建國垂三十年，不遭兵燹之區則地方各署檔案多散佚。此後能倡議每省建一檔案庫，每三年或五年將各署擇要存於此，分類整理編纂，蔚為地方史之志材，其功用當較碑傳集更巨。」見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頁411。又曾記曰：「川東師範圖書館藏有中華書局出版之《清史列傳》可借參考。此書聞於二十五年亦被禁止，當局對於史料輕於禁止，而各衙署所藏檔案、史稿亦輕於遺棄，不學無術，勇於專制，無識極矣。」見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21。

⁵⁰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978-979。

⁵¹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01-107。

⁵²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頁1-4。

設立檔案庫，保存書寫國史的史料，尤其政府檔案是史料的大宗，過去並不受重視，在戰亂當中更是佚失不少。於是，因為戰爭的關係，無論是國史館或檔案庫，在朱氏的論述中，都同時具有其重要性。

在國史館的工作方面，文中指出：因史館未設，故所謂將辭世官員「宣付國史館立傳」實際上並不能執行。且若無史館記載捐軀報國、毀家紓難等事蹟，將無以鼓舞群倫。⁵³事實上，「宣付國史館立傳」係中國古代的傳統，民國以後，仍然有所承襲。⁵⁴只是在古代是為了樹立道德典範，進入民國，尤其時值抗戰軍興之際，將為國犧牲奉獻者宣付史館立傳，就有提振士氣、凝聚民心的作用。另外，文中提到：根據唐宋的修史制度，有所謂時政記（類似中央黨部及行政院重要會議紀錄）、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史館匯為史料後，旁稽野史外記，博採文集奏疏，分朝撰進，謂之國史。惟起居注、實錄宜廢；時政記、日曆、國史宜復，統歸國史館編輯，而國史館直隸於國民政府，設於府內，與總檔案庫相近。⁵⁵所以，在朱希祖規劃下的國史館，雖然有若干承襲古代之處，但已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認為不合時宜者也未再保留。

在檔案保存方面，則提到宜採英國的制度，將當時可發表者印成藍皮書，公布發賣；屬秘密檔案，一時不可發表者，則存於特別檔案庫，嚴密保存，將來作為史料。而總檔案庫設於國民政府，貯藏各院部會之機密重要檔案正本，俟時效已過，或取出發表於時政記，或終藏於檔案庫，將來擇其宜者，作為史料。⁵⁶由

⁵³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9-10、14。

⁵⁴ 例如光緒三十（1904）年正月十四日上諭：「吉林將軍長順忠勇樸誠、勳勞懋著。……照將軍例賜卹生平戰功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見《東方雜誌》，第1卷第2期（1904年2月），頁22。北京政府時期也有宣付清史館立傳的案例。見蔡炯昊，〈新國體下的舊史學—民國初年的宣付清史館立傳（1914-1927）〉，《學術月刊》，2017年第10期（2017年10月），頁166。至國民政府時期，在1937年3月27日所頒廣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黃慕松的褒揚令上，仍有「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字樣。見《國民政府公報》，第2314號（1937年3月30日），頁2。

⁵⁵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11-12。

⁵⁶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8-9。

此一規劃可知，朱希祖主要是聽取周培智談論英國的檔案制度後，加以師法。

所有相關工作中，朱希祖認為總檔案庫及時政記二事當先行辦理，以減少檔案數量；其次是劃清黨史與國史的界限；最後再規劃日曆及國史。⁵⁷ 因此，雖然該文一開始先提撰寫國史的必要性，再論及檔案的重要，但在朱氏的心目中建立總檔案庫似具有相對的優先性，故提案名稱亦將檔案庫置於國史館之前。

朱希祖之所以特別重視檔案庫的建置，與其交遊及對西方史學的認知當不無關係。據朱氏日記記載，1934年，姚從吾甫從德國留學返國，即往訪朱。⁵⁸ 而且，1935年7月28日至8月1日，他連續閱讀姚所編《歷史研究法》一書。1936年8月25日及9月4日則分別與姚暢談史學。⁵⁹ 由此可推知，姚在德所學的史學方法，應或多或少對朱產生影響。另外一位可能讓朱氏對檔案或檔案館的重要性有更多認識的則是滕固。朱氏長子朱傑（1907-1968）與滕固1930年初識於德國柏林，此後兩人相交益厚，時相過從者還有姚從吾等人。滕固回國後，任行政院參事，朱傑則任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公暇課餘，仍互相往來。⁶⁰ 1934年，朱希祖初至中央大學任教時，滕固即應朱傑之請出席餐宴，之後雙方亦有圖書之借贈。後來，朱希祖獲聘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滕固為常務委員。兩人同行考察古物，並共同草擬「古物之範圍與草案」。⁶¹ 1936年2月，當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關欲發起史料展覽會，委朱希祖撰〈史料展覽會徵集史料啟〉時，他對於自元代以上一切藏於政府之檔案，已全數不復見，表示「此誠可痛惜者也」。又云：「民國初建，售內閣大庫檔案者有之，焚明代刑部檔案者有之；國都南遷，則段氏執政時之重要檔案亦時見於故都市肆，其他零星散佚者不知凡幾，足見國人蔑視史料之一斑矣。」而歷代修史，皆有偏私，且多缺略，若歷代檔案皆在，就能加以糾正，「足見原始史料即今世所謂檔案者，視已成之史實更重要」。「故歐洲各國，今皆特設檔案館，且有分設中央檔案館與地方檔案館者，咸分類編

⁵⁷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15-16。

⁵⁸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72-374。

⁵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528、691、696。

⁶⁰ 朱傑，《天風海濤樓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65。

⁶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頁314-316、343、351、368；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458、467、470、476。

目，以待修史之取材，司其事者，類皆為大學校史學主任、教授」。⁶² 由此不難發現，當時他已充分了解檔案保存和檔案館的重要性，亦可見他和姚、滕二人有著相同的認知。其中，姚從吾曾謂，近代歐洲各國設有各種檔案館，「主持館事者，類皆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⁶³ 而朱希祖也延續了這樣的說法。

至於「黨史」與「國史」的劃分，朱希祖於1936年給黨史會主任委員邵元冲的信中曾提及：「國民政府未成立前，固多黨史；訓政時代未完成之前，亦屬黨史。……然今黨史範圍是否如斯廣大，抑或有所限制於國府成立以前，希祖身在局外，實未能深知。如或分而為二，國府成立以前為黨史，國府成立以後屬國史，則今之國史亦決不宜從緩。」⁶⁴ 即黨史和國史的劃分應以國民政府成立的時間為標準。在〈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中，則謂「民國元年以來，至國民政府成立以前之國史，必宜先修」。⁶⁵ 無論在朱氏心目中，是以何項時間標準來劃分黨史和國史，但提出此一問題，作為次要辦理者，可見他仍認為，黨史和國史應有所區隔，亦應是意識到在黨史會已成立的前提下，國史館的業務應具有獨立性。

質言之，因為中日戰爭的關係，朱希祖在〈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一文中，強調國史書寫和檔案保存的迫切性，國史館和檔案總庫成了可以並行不悖的工作，消解了前此兩者的相互衝突。其次，該文提出劃分「黨史」和「國史」，亦稍微鬆動了先前黨史會成立後，在黨史幾乎等同國史的概念下，國史館無立即必要性的格局。

⁶² 朱元曙、朱樂川，《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頁491-492。

⁶³ 孟森，〈中國歷代史料之來源並擬現代可以收集之方法〉，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會編輯，《文獻特刊》，頁33。

⁶⁴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鄭亭詩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02。

⁶⁵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14-15。

叁、著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的建置

一、決議成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

針對「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原則通過，送國民政府妥籌辦理。國民政府則以建立檔案總庫及籌設國史館兩事，關係重大，擬先徵詢五院意見。⁶⁶ 後來行政院表示，現中央各機關檔案可送總庫者尚不甚多，且總庫之建築設計、保管人員之訓練，及檔案歸庫條例等項，皆須縝密籌劃，似可聘請專家組織委員會，通盤計議；至國史館之籌備，亦可交該委員會負責辦理審查會；「目前除設立委員會籌備檔案總庫及國史館外，似不宜有更積極之推動」。⁶⁷ 行政院對建立檔案庫並附帶籌備國史館一事雖仍顯保守，但已不再像1934年時那樣地反對設立國史館。只是，國民政府於整合各院意見後仍以為：

值此戰事未戢，庫款支絀之際，總檔案庫之難以勘定地址、從事建築，已如前述。至於國史館修史之材料，雖不必盡取給於各機關之檔案，而檔案為史料之淵海，時政記須就檔案纂輯，……是總檔案庫之建立應在設置國史館之前，似無疑義。……就目前情形言之，總檔案庫宜有專家設計，建築完成更須極大經費、相當時期，而地址又迄難於定妥，則在最近期內，急遽建立，或設籌備委員會，似不免徒耗國帑，無裨實際，故須從長計議。……仍准先行籌商，俟軍事結束，再行切實辦理。⁶⁸

至此，無論是國史館或檔案庫之設，似都面臨停擺。尤以國民政府認為檔案庫應設在國史館成立之前，檔案庫已窒礙難行，更遑論國史館。

不過，後來籌設國史館一事卻又有了轉機。在1939年11月17日的國民黨五屆

⁶⁶ 「國民政府文官處函行政院等」（1939年2月22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2-002。

⁶⁷ 「行政院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39年3月17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2-007。

⁶⁸ 「國民政府文官處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39年11月9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2-014。

六中全會上，林森等12人提議將黨史編纂委員會改稱國史編纂委員會。理由為：行政院所旌獎國內外官吏暨地方賢良等案，凡經國民政府褒揚者，均將其人之事蹟交付黨史編纂委員會備列史料，因此，黨史編纂委員會非僅專纂黨史而已，故請改會名，以符事實，俾推進黨史國史工作。決議：原案所請，施行頗有窒礙。關於國史編纂，在五屆五中全會曾有「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案」，送國民政府妥籌辦理。如因經費、地址，不無困難，可先設立國史館籌備處，主持徵集編纂國史史料並籌備進行事宜。⁶⁹於是，在黨史會直接改組成國史編纂委員會的提案遭到否決後，在先前「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案」的基礎上反而得以設立國史館籌備處，而此一決議也表示，黨史與國史工作將走向分途。

該案後來送交國民政府臨時會議討論。張繼以同時也是黨史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先發言指出：一般人所說，中華民國是國民黨所創造的，黨史就可作為國史，但實際是不然的。如北京政府時代的事蹟，不能不認為是中華民國史的一部分；再，民國成立以後到現在專管檔案的機關可以說沒有，北京政府的檔案是否已完全運到南京，大家多不知曉，所以國史館及總檔案庫皆有設置必要。接著，馮玉祥也認為黨史不能包括國史，並提到其時國史更為重要，因為知道國史，才能愛國。另外，葉楚傖表示：現在世界各國對於歷史並非重視編史的文字，而是重視「文獻」。編史的人可用其所謂「曲筆」，「文獻」則是不會變更的，且可作為制度改革的參考。有了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不僅國史史料之蒐集整理保存可以辦理，且可作為政治經濟種種文獻之庫藏，隨時公開發表。會中，多數委員贊成葉楚傖的意見。主席林森則提到，《清史稿》的內容很多紕謬，對國民黨多有誣詬之處，將來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應簽註出來。最後決議：設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由國民政府委員七人組織之，並以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另外，將《清史稿》內紕謬之處，交該籌備委員會詳細簽註，以備刪除。⁷⁰後來，林森推定張繼、鄒魯、葉楚傖、鄧家彥、王伯羣、楊庶堪、胡毅生為籌備委員會委員，張繼為主任委員，獲得通過。⁷¹至此，1939年初朱希祖所提籌設國史館一事至年底情勢逆

⁶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39年11月28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2-015。

⁷⁰ 「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速記錄」（1939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十五）〉，《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46100-00025-001。

⁷¹ 「國防最高委員會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40年1月7日），〈國史館沿革史（二）〉，

轉且得以確立。而依據相關提案及決議，該會被賦予的工作，主要在於蒐集有關國史之史料，包括受政府褒揚人物之事蹟，還有籌備國史館，以及簽註《清史稿》。

從最終仍決議成立籌委會一事來看，其實是略微改變了前此以建立檔案庫應優先於設置國史館，或是以檔案庫為主附帶籌設國史館的看法，而以籌備國史館為最終目的，但國史史料的蒐集保存在討論的過程中仍具重要性，只是檔案庫之名未被凸顯。整件事也顯示，籌委會之所以設立，仍是在「國史」的大纛下，而中日戰爭乃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即需藉由「國史」來凝聚民族意識，加強抗日精神。這一點，從保存褒揚人物事蹟一事所引發，黨史會擬改稱國史編纂委員會的提案，亦可提供一些說明。

朱希祖曾謂：「吾國僅有黨史編纂委員會，其史料徵集及審訂通則，皆以黨員事蹟為限，何能盡國家及社會全體之史職！」⁷² 就1933年9月13日，國民政府內政部公布的「烈士附祠辦法」來看，判定烈士身分的標準在歷來為國民革命犧牲者，即其前提必須是黨的烈士。但隨著中日戰爭爆發，戰區範圍與參戰軍民人數不斷擴增，1938年3月25日國民政府公布「戰地守土獎勵條例」，對象已正式擴及為戰時守衛國土之傷亡軍民或有功人員。⁷³ 由於在戰爭中犧牲奉獻的人是不分黨派的，因此，以國史的名義，由籌委會蒐集戰時為國犧牲或對國家有功人員的資料，是勢必得採取的做法，也是黨史不能再代表國史的外在原因。另外，戰爭所帶來的苦難與傷亡，往往要透過哀悼、紀念儀式，以得到補償與救贖，同時也昂揚眾人的鬥志。⁷⁴ 而中國古來即有「名垂青史」之說，故宣付史館立傳，實為一項重要的紀念儀式。如果說在國族建構過程中，仍不免要藉由「民族英

《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2-023。

⁷²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頁350-351。

⁷³ 張世瑛，〈國民政府對抗戰忠烈事蹟的調查與紀念〉，《國史館館刊》，第26期（2010年12月），頁13-14。

⁷⁴ 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收入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頁169、178。

雄」，以塑造忠誠、自我犧牲的楷模，激發人們為國族奮鬥的精神，⁷⁵ 那麼，在中日戰爭期間，藉由「史館立傳」的做法似已成為形塑戰爭記憶和近代國家的一環。而從這一角度來說，「國史館」的名稱其實或多或少已有了國族或現代民族國家的意涵。

總之，朱希祖的〈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可謂間接促成了籌委會的設置，雖然最後並未完全按照朱氏原來的設想，但該文同時反映時代與學界的呼籲，應是最終獲得回應的重要因素。

二、朱希祖規劃下的籌委會

「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案」提出之際雖一時未能順利通過，但在籌委會成立後，由張繼擔任主任委員，執筆此一提案的朱希祖因此仍受到重用，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朱氏以一歷史學者身分，在籌委會草創階段，擬將理想化作現實；又，在史學成為一門專業化學科之際，他也期許讓該會的工作能與專業化的史學接軌。

1940年1月9日，張繼訪朱希祖，告以政府已決議設立國史館，先成立籌委會，進行籌備，一年後即設國史館，直隸國民政府，並委朱氏進行規劃，最要者為三事：「一、本會內部組織如何。二、本會應籌備之事為何。三、檔案庫是否即應設置。」⁷⁶ 隔日，針對國史館組織問題，朱氏立即寫了一封信給張繼，謂籌備之際，最重要者是先設一類似秘書長之職，使其能負責赴事，不致為同儕所掣肘。又凡調查材料、籌劃事業、審核要件、決定大計及奉行委員會決議案，惟彼一人是賴。⁷⁷ 1月20日，張即欲朱氏擔任秘書長一職，負國史館籌備全責，其下則設秘書及總務、採訪、設計三組主任，只是朱氏必須辭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及教授之職，但仍可兼課。同時告以，擬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汪東（1890-1963）及國民政府秘書但燾（1881-1970）為顧問，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金毓

⁷⁵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頁87。

⁷⁶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40。

⁷⁷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40-1141。

黻（1887-1962）為秘書兼採訪組主任，朱則另薦重慶大學史學系教授張聖奘（1903-1992）為設計組主任。此外，張繼還委託朱氏擬訂〈組織大綱〉。⁷⁸

1月23日，朱希祖將完成的〈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交付張繼。25日，至張宅談話，得知組織法修改：秘書長本由會中聘任，改為由國府主席簡任；裁去採訪組；改設計組為第一組，下設專員二人，一任採訪、一任設計。於是，朱氏改推薦金毓黻為第三位顧問，張聖奘為第一組主任，並約定專員二人，須物色史學系畢業之高材生。26日，朱即請張聖奘任第一組主任，並縱談籌備事宜及搜輯史料方法，還有近代史學發展的利弊。2月2日，再與金毓黻談籌備會事，請彼擔任顧問，並暢談調查史料事宜。⁷⁹ 張聖奘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在北大時曾至朱氏史學概論課堂聽講；畢業後留學美國，學史學及經濟；回國後在上海各大學任教，又留學英國三年，曾至法國、義大利、德國調查各國檔案庫；並曾至俄國調查其東方史料；回國後任重慶大學教授。⁸⁰ 可見，他有史學背景，又有歐洲各檔案館的閱歷。金毓黻則是朱氏在北大的學生，朱認為在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當中，「其人尚可親，為學亦頗忠實」。⁸¹ 在朱氏看來：「金能蒐集史料；張能規劃史例、調查歐美各國檔案收藏及整理法，頗為主要人物，餘皆官場應酬而已。汪（東）、但（燾）二君可撰國史館列傳，尚屬可用。」⁸² 所以，朱氏認為，金、張二人是該會主力，史館的規劃及史料或檔案的蒐集、管理則是首要之事。

不過，至2月5日，張繼再與朱希祖見面時，已將第一次決議全行推翻：改秘書長為總幹事，不支薪，僅支辦公費，仍由朱氏擔任，可不辭中央大學教授；秘書改為副總幹事，由但燾兼任。顧問三人加為六人，又另聘名譽顧問若干員。對此，朱氏頗為不滿，認為：「籌備委員會聘人愈多，將來國史館人愈雜，必無好結果。……顧問人多而無明定職掌，而組主任又非能採訪、設計之人，如何指揮？總幹事不預聞組織大計，有其名而無其實，將來外人批評則叢罪於其身。又

⁷⁸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44-1145。

⁷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45、1147-1149。

⁸⁰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43-1144。

⁸¹ 朱元曙、朱樂川，《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頁589。

⁸²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鄭亭詩稿》，頁223。

兼職而又責以專職辦事，終日坐辦於會中，亦屬笑談。總幹事豈可為哉？」朱希祖以組織大綱之敗壞，是張繼遷就顧問所導致，表示不願就總幹事一職。經張繼加以慰留，並允其補救辦法三條，朱乃答應。⁸³ 根據後來張繼所呈送的組織大綱，顧問雖維持六人，但已無名譽顧問之設。其次，總幹事雖仍係兼任，但「位置專家，綜攬一切」，由委員會聘定，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會中一切事務。再次，明定各組主任，承主任委員之命及總幹事之指導，分掌各組事宜。⁸⁴ 由此一過程可知，在人事安排方面，朱希祖除了希望總幹事能專職擔任、掌握實權外，也希望能夠任用具史學專業的人士，但仍不免有些事與願違，也暴露該會在人事安排上面臨著許多外在的壓力。不過，把秘書長改為總幹事係仿照中央研究院，除了因該會係暫設性質，也因作為學術機關，暫不列官等，用人可不經銓敘，節省籌備的時間。⁸⁵

朱希祖後來又撰寫「國史館籌備大綱」及「鑑別史學人才條例」。至張繼住處示以「籌備大綱」時，並同至但燾之寓，但氏亦列一「辦事細則」，主張顧問列在總幹事之上。朱則認為「謂顧問等於翰林院修撰，不知總幹事等於何職」，將造成系統不明、主客不分。29日，朱氏再與張繼談總幹事應改在顧問之上，得到同意，同時出閱〈史官學術標準〉一篇。⁸⁶ 可見朱氏對總幹事與顧問的位階，以及如何引進史學人才等問題的重視。

再據後來所見之籌備大綱，在組織籌備一項中，除國史館官制外，「史官標準法及登用法」及「儲才館條例」都和人才的晉用與養成有關。朱希祖說明，史官人才必須有至少之學術標準，不可任情率用，宜招考各大學史學系畢業高材生，學行優異者，教學三年，使史學與文章均能卓然有立，選其尤優者備充史

⁸³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50-1151、1153。掌採訪、設計的第一組主任，朱希祖原本推薦張聖獎擔任，但從籌委會的歷年職員動態表可知，後來改為余祖明。見「籌委會呈國民政府工作報告書」（1947年3月14日），〈國史館沿革史（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4-001。

⁸⁴ 「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呈國民政府主席」（1940年2月9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典藏號：001-016222-00002-028；「國民政府函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40年3月5日），〈國史館沿革史（三）〉，《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3-003。

⁸⁵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廊亭詩稿》，頁224。

⁸⁶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56-1157。

官，且必須限定史學系畢業者。⁸⁷ 另外，他在寫給女婿羅香林的信中也提到將來國史館史官擬用類似考試法取才，如平日之史籍著作、傳記文章為第一必需條件，臨時再試作名人傳一篇，以定高下，「蓋此等作品可以見其才學識三長如何程度也」。至於才學識三長的定義為何，他在給其女朱倓的信中言：「作史事，業須備三長：一文章雅潔，二考訂精確，三見識高深，須明社會科學及哲學。」也提到：將來擬於史館中特設儲才館，選各大學史學系畢業生，課以本國各斷代史及史法、歷史文學，補習社會科學及哲學，畢業時選其成績及文章尤佳者補史官。⁸⁸ 總之，朱氏希望能吸納受過大學史學系教育的專業人才，再加強社會科學等訓練之後，有史籍著作，及具備才、學、識三長者，才讓其擔任史官。準此，不無就是要讓史館朝向一個具現代史學專業的機關發展。而當時大學的歷史系也確已成為建立史學標準化技術程序的重要場所，學生在學習後，也接受了一套具有客觀標準的研究規則。⁸⁹ 故朱氏之強調要用大學史學系畢業生，亦意味史館將與現代學術體制有所連結。

其次，在是否設置檔案庫的問題上，「籌備大綱」也給了明確的答案，包括調查檔案、籌備檔案總庫、整理檔案辦法、籌備時政記等均被納入「國史館史料籌備」的工作項下，籌設檔案總庫成為該會工作的一部分。說明中並謂須先調查歐美各國對於檔案儲藏、整理、發表三種成法，再規劃檔案總庫及檔案錄副辦法，最後再規劃如何整理，及發表於時政記。⁹⁰ 均顯示將來國史館的定位已經不再只是傳統的史館，也同時具備類似歐美檔案館的角色。⁹¹

⁸⁷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20-124。

⁸⁸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鄭亭詩稿》，頁227-228。朱希祖本身曾在中日戰爭期間，應教育部徵求大學課程標準之意見時提出，課程仍應按各校的實情訂定，惟不許違背原則，包括：造就史學人才，目的宜確定，然後分擬課程；中外歷史不宜偏重；須以若干社會科學為基礎；基本的歷史輔助科學必須完備等等。見朱希祖，〈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審查意見〉，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頁336-337；周佳榮，〈朱希祖與北京大學史學系〉，收入李金強等著，《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86-87。故朱氏對於史官的培養，實有一套接續大學史學教育並依史館所需造就人才的想法。

⁸⁹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頁315。

⁹⁰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21。

⁹¹ 朱希祖曾在〈史料展覽會徵集史料啟〉一文中指出，歷代修史皆取資於藏於政府之詔令、奏議及一切公文，及至史成則此等史料皆輕棄而不珍惜；相對地，歐洲各國皆特設檔案

在實際用人方面，除前述的金毓黻和張聖奘之外，朱希祖也陸續進用了具備史學背景的學子到籌委會擔任幹事。⁹² 蔣逸雪（1902-1985）畢業於南京國學專修館、廈門大學國學院研究院，著有《張溥年譜》一書，張繼託朱希祖代為撰寫書序，朱後來以蔣「文筆雅潔」，且曾著有《陸秀夫年譜》，就聘其為第一組幹事。同時聘為幹事的還有李菊田（1910-1985），李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學系，專門研究《戰國策》，「頗能考證，有心得，文筆亦雅，詩尤佳」。當時還有其他北大、中大史學系畢業生五六人欲來，但「觀其作品，皆蕪類而非著作才，故皆不入選」。⁹³ 是以，能著作是朱氏選才的重要條件。相對於當局所用、委員所薦，「皆不能辦事，反多掣肘」，不禁讓朱感慨，官場用人大都如此。⁹⁴ 後來，他又向張繼推薦中央大學歷史系助教朱煥堯為幹事，張氏允可，朱煥堯即到職。⁹⁵ 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的傅振倫（1906-1999）則是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時的學生，經由朱氏介紹，張繼又以河北同鄉之誼，憐其自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辭職後失業，委為額外幹事。⁹⁶ 傅氏就讀北大，及畢業後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擔任助教期間，朱希祖正主持整理明清內閣檔案的工作，傅氏因之得以涉獵這些史料，並領悟到檔案與歷史研究的密切關係。之後，到西歐旅遊時，曾參觀英、法的檔案館，並寫有〈遊英法檔案館小記〉；還曾到蘇聯，親身接觸該國檔案館的資料。⁹⁷ 因此，傅氏除了出身史學專業外，也有整理檔案的工作經驗，且了解歐洲各國檔案館。後來，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的曾祥和（1920-

館，保存歷代檔案、原始史料，並加以分類編目，以待修史之取材。見朱元曙、朱樂川，《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頁491-492。此處沿用此一看法，以中國傳統史館未如歐美檔案館重視原始檔案史料的保存。

⁹² 朱希祖稱：「幹事雖小，然亦等於各部主事（舊制），且擬用史學系畢業生，故黃仲琴不合格。」見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鄺亭詩稿》，頁226。

⁹³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57、1162、1164；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鄺亭詩稿》，頁228-229。

⁹⁴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鄺亭詩稿》，頁229。

⁹⁵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79、1184。

⁹⁶ 傅振倫，《蒲梢滄桑—九十憶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0-51、55、143；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82。

⁹⁷ 傅振倫，〈六十年檔案工作憶往〉，收入氏著，《傅振倫文錄類選》，頁407。傅氏的〈遊英法檔案館小記〉一文，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會編輯，《文獻論叢·論述二》（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年），頁1-9。

2013) 也曾受到賞識，推薦到籌委會工作。⁹⁸ 大致而言，朱希祖在選用籌委會的組成成員方面，頗能從學識、專業方面著眼，落實其選才的理想。

不過，在整體用人方面，張繼並沒有完全聽從朱希祖之建議。例如，朱推薦中山大學教授、亦為其婿的羅香林為顧問，張繼原允可，不過卻因為第二組主任何承天之言，以羅為朱之婿，應避嫌，故婉言不聘羅。⁹⁹ 又考試院秘書錢海岳著有《南明史》十冊八十卷，曾自薦於朱氏。朱認為其「篤志專精，亦有特長可取，以視會中所聘五顧問，實高出一籌矣」。但是張繼以顧問為兼職不甚得力，無意延聘。朱則認為張「勇於進駑，怯於引駿，嗚呼！其鑑別力可知矣」。雖經二度力薦錢，張仍未允。¹⁰⁰

從籌委會獲准成立之始，朱希祖即參與相關規劃事宜，舉凡「組織大綱」、「籌備大綱」、「辦事細則」都是出自他之手，故其在此階段投注甚多。其原先建立檔案庫及籌備國史館的理想，隨著籌委會的成立，總算有了實現的機會，雖然籌委會名義上是籌備國史館，但因為也被賦予徵集編纂國史史料的任務，後來籌設檔案總庫也成了該會工作的一部分。另外，在用人方面，朱氏希望能物色大學史學系畢業的高材生，經過訓練及著作的考核後，才讓其擔任史官，從種種的過程看來，無非是要讓史館得以與現代學術體制接軌，而在籌委會的階段，他也已開始進用具有史學背景的大學畢業生。

⁹⁸ 根據曾祥和的回憶，選修朱希祖的戰國史課程時，因為所寫的報告受到賞識，所以朱氏就常找她和另一位同學黃少荃到他家。曾氏自中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傅斯年曾找她到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不過因為朱希祖希望她可以繼承南明史的衣鉢，就「命令」她到籌委會工作，同時她也接到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的聘書，於是打算先教一年書，再到籌委會，只是等她教完一學期後，朱已過世。見沈懷玉、游鑑明訪問，周維朋記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頁138、198-199。

⁹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79；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廊亭詩稿》，頁233。

¹⁰⁰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82-1183。

肆、在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的工作情形

1940年2月，籌委會成立於重慶李子壩，草定章則、延聘人員、購置器物；4月，遷歌樂山向家灣；5月，正式辦公；至國史館於1947年1月20日成立，將所有事務移交後結束。該會原擬以一年為籌備期，一年後即設立國史館，不過，因為政府的財力與重心均集中於軍事，故決議延期，以籌備名義兼代史館初期的工作。因此，初期較側重計劃國史體例、史料整理，及起草有關國史館法規，並史料採訪事宜，以為開館之準備。後來，史館未能急切觀成，體例設計，範圍有限，乃移其工作重心為史料之編輯與採訪，以保存史實，免為戰爭之灰燼。¹⁰¹ 該會業務發展至結束之際的情形，大致可從其組織系統（圖1）中看出。朱希祖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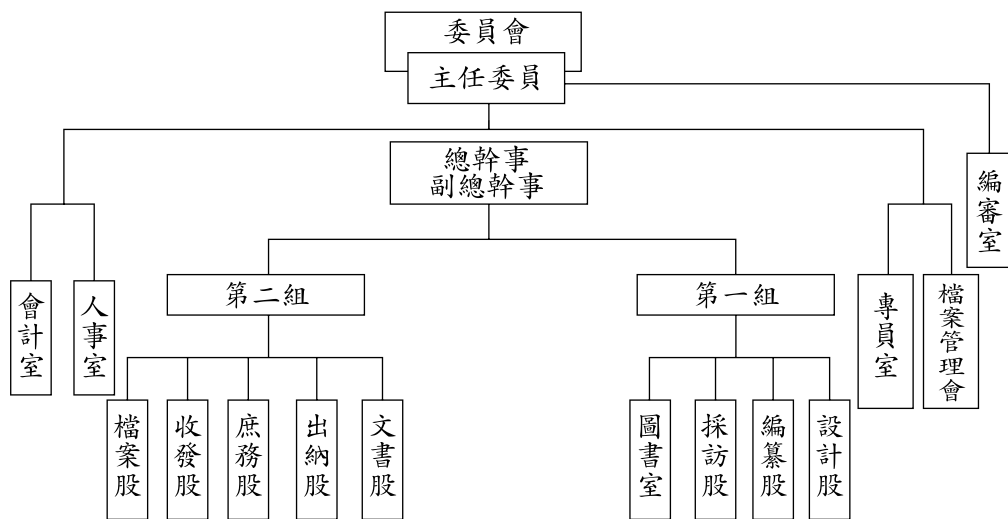


圖1、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籌委會呈國民政府工作報告書」（1947年3月14日），〈國史館沿革史（四）〉，《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222-00004-001。

¹⁰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40；「籌委會呈國民政府工作報告書」（1947年3月14日），〈國史館沿革史（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4-001。

1941年2月10日，辭去總幹事一職，改任顧問。12月27日，再請改為名譽顧問，該案通過並自1943年1月起生效。¹⁰² 故其在會期間的工作重心，主要仍著重在史館的制度、修史體例等的規劃及史料的採訪。以下即就朱氏所從事的工作做說明，並及於他的想法後續落實情形和相關影響。

一、設計工作

（一）史館制度與國史體例

朱希祖曾為自己的事業制定九等標準，其中第四等是：「兼顧身家，亦事著作，為國史館以造成現代完善之史。」¹⁰³ 所以他對國史館的工作有一定的期許。

籌委會正式辦公後，朱希祖主要負責草擬國史館官制及史例，¹⁰⁴ 在他擔任總幹事一年期間共寫有《國史事例雜議質疑》、〈改國史館為國史院議〉、〈史官名稱議〉、〈國史分三體議〉、〈國史中紀、傳、志體名稱議〉等。¹⁰⁵ 而從《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一書（包括〈史館制度駁議〉、〈國史史體駁議〉、〈國史史例駁議〉），大致可以一窺他對相關問題的看法。

朱希祖之所以寫作此書，主要係針對但燾所著《國史事例雜議》，他有完全不同的想法（雖然兩人都是出於章太炎門下）。1940年7月31日，朱氏在日記中提到，與蔣逸雪、朱煥堯、李菊田三幹事讀但燾之《國史事例雜議》，「其間議論乖張、史實錯誤，且有文理不通者。若登載於國史館籌備會會刊，必遭外人攻擊，敗壞本會全體名譽，咸謂不如會中同人先行駁正，再想阻止或發表辦法」。之後，朱即連日撰寫駁議，至8月27日始全部脫稿。¹⁰⁶ 姑且不論朱、但二人見解之對錯，值得注意的是，進入民國以後，傳統的史館或修史制度如何適應新的時代，從二人的意見對比中，或更可看出朱希祖的想法。

¹⁰²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41、1333、1337。

¹⁰³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074。

¹⁰⁴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80。

¹⁰⁵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16-1217、1240-1241。

¹⁰⁶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10-1217。

首先，雖然但燾和朱希祖都主張國史館應改稱國史院，不過但氏指出國史院宜闢六館，分別為：明史館、清史館、太平天國史館、中國通史館、列國通史館、會典館（掌修《民國會典》）。朱則提出反駁，認為明史等六種，是要有餘財、餘才、餘時才能從事，且既稱國史，就要以當代本國史即中華民國國史為主，不能喧賓奪主。¹⁰⁷ 但氏之所以欲設明史館，係認為：「明史修於清代，秉筆者屈於淫威，曲為之諱。章太炎先生讀開國方略，特著清建國別記，以發數百年之覆。」¹⁰⁸ 作為章門弟子，提重修明史，可以說就是延續章太炎「反滿」的立場，清史館或太平天國館之設，亦應是循此思路。至於設立中國通史館，北京政府時期國史館的職掌就曾列有纂輯民國史、歷代通史，¹⁰⁹ 而「中國通史」之出現，是來自清末「中國無史」的危機感，對民族主義有強烈需求。加以，源於西方的「國史」觀念，透過日本「東洋史」傳入，並提供寫作範例。¹¹⁰ 故以清朝的國史館來說，並不處理通史，只涉及當朝史。¹¹¹ 可見中國在歷經種族革命，走向民族國家之際，對於「國史」的範圍，有了不同的詮釋，不過朱氏明確將「國史館」名稱中的「國史」定義為本國史、當代史。

其次，針對國史院的隸屬問題，但燾主張隸行政院，朱希祖則認為應隸國民政府。朱氏指出，古時史官受宰相牽制，難伸直筆，且史官由宰相辟除，容易任

¹⁰⁷ 朱希祖，〈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一〉，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53-54。

¹⁰⁸ 但燾，〈修史雜議〉，《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3號（1948年8月），頁4。

¹⁰⁹ 例如1912年10月28日公布的「國史館官制」第一條即明訂：「國史館掌纂輯民國史、歷代通史」；1917年6月26日所擬定之「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簡章」第三條規定：「纂輯股兼纂輯民國史及歷代通史」。見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31-32、44-45。

¹¹⁰ 李淑珍，〈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的創造與轉化〉，《新史學》，第19卷第2期（2008年6月），頁88、93-94。另外，將歷代興亡的歷史放入國史的框架，成為「中國史」，是中國在近代列強環伺，特別是對日本感到屈辱，受到日本影響下的產物，以期能重新描繪出一個清楚又鮮明的傳統，在世界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見平野聰著，林琪楨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臺北：八旗文化，2018年），頁22-25。

¹¹¹ 林滿紅指出，從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史館檔」（清朝國史館檔案）的類目中可以得知，國史館是蒐集整理當代檔案，並撰寫當代歷史的政府機關。參見林滿紅，〈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49。

用私黨，若國史館隸行政院，難免這二方面的弊端；若隸元首，則史官不受執政牽制，不為私黨左右，較為適宜。另外，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院，軍事、經濟等委員會皆非直隸行政院，則全國史料攸關之檔案紀錄不全在行政院，而國民政府為施令中樞，全國政治皆由其頒布命令，然後施行，雖無執行之實權，而史料所聚，反較行政院為多，故為徵集史料計，亦以直隸國民政府為宜。¹¹² 朱氏欲將史館置於國民政府而非行政院之下，一方面是為了從制度上維護史官獨立超然的立場、秉筆直書的精神，以保持史學的客觀性，避免政治力干擾；¹¹³ 另一方面則是為檔案徵集之便。當然，讓史館直隸於國民政府，不無有抬高史館層級、凸顯國史重要性的用意。¹¹⁴

又關於史官的標準，但燾提出：「非高材博學、躬與創業者，不得受任大著作；而著作則以文辭雅正、多識舊聞者居之；其著作佐則屬之熟練史法、學有專長者；才不中著作者，初試，但署著作佐、著士。」但朱希祖指出，第一等史官「大著作」，若非躬與創業者不可，則自創業而自作史，不免誇大諱飾。且高才博學者，未必躬與創業；躬與創業者，未必高才博學。史家需具有三長：史才、史學、史識。才高博學而無「識」則華而不實、博而寡要。又第二等史官「著作」之標準，同樣有注重才學而不重「識」之弊。所謂文辭雅正，必偏重舊日古文，而捐棄新名，且與史之重視錄寫事實相背馳；所謂多識舊聞，往往涉略不精、雜亂無章，且蔑棄新知，與今日繁複之史學相悖。再者，第三等史官「著作佐」之標準，所謂熟練史法，非高才博學加以卓識不可，卻屈居於著作佐。第四等「著士」，文辭既不雅正、舊聞又不多識、不諳史法、學無專長，何能任國史館之職。¹¹⁵ 是以，在朱氏的心目中，成為史官的條件包括熟練史法、具備才學識

¹¹² 朱希祖，〈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一〉，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57-60。

¹¹³ 中國傳統的史官固然可能在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壓力下曲筆，然而曲筆在中國史學傳統裡是一種可恥的敗筆，視為穢史，所遵奉的是直筆。見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147。

¹¹⁴ 朱希祖曾說：「國家蔑視國史，其國祚能悠久永昌者，蓋尠。……蓋國史者，國家之英華，民族魂魄之所寓。尊而崇，即所以尊國家、崇民族也。」見朱希祖，〈改國史館為國史院議〉，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18。

¹¹⁵ 朱希祖，〈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一〉，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72-77。

三長、能吸收新知，要比具有親身參與的經驗或博學有文采重要得多。這也可以看出，朱氏對新一代史官的要求，相對更重視其專業性和學術性。

對於國史的書寫體例，雙方也有截然不同的見解與看法。但燾提出依劉知幾《史通》中六家的分類，但朱希祖認為，國史院以當代國史為主，不必根據劉氏的分類一一模仿。¹¹⁶ 又但氏擬在國史院分別修撰計七類十六種模仿前代之各種史體、史書，對於此舉，朱氏不無擔心地表示：「徒欲誇耀宏富，不知慎加別裁，甚且牴觸國體，違戾民意，恐此議一出抨擊者多。」¹¹⁷ 因此，他的想法是，進入民國以後，修撰國史的體例當與國體相配合，對中國古代的修史體例當有所取捨。

同樣地，但燾提出設起居官，曰：「近代無起居注，惟日記、日報、會議紀錄，差為近之。」朱希祖則認為，民國元首，由人民公舉，不應如帝王時代，而設起居注官。日記為私人記載；日報、會議紀錄記政務官行動言論為主，其他為群眾之言論行動，不可比擬起居注。但氏又言設實錄館，朱氏同樣不以為然，認為古代帝王崩殂時，始臨時設實錄館，書成則解散，實錄館為暫設，而國史館為常設之署，不可相混。且實錄與起居注，皆為帝王而設，有悖於國體。¹¹⁸

朱希祖以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研究，¹¹⁹ 加上對國家和政治體制變化的覺察，還有身處中國史學走向專業化的階段，希望對所謂「國史院」提出一套在體制上符合時代環境，在用人上又能符合史學專業的規劃，企圖推動史館向更符合現代

¹¹⁶ 劉知幾所謂六家，包括：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記家通古、漢書家斷代。朱希祖，〈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二〉，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84-85。

¹¹⁷ 但燾所擬史體表，包括：一、正史：國史；二、編年史：日曆、國史綱目、民國紀、時政記、大事記、起居注、實錄；三、紀事本末：國史紀事本末；四、國別史：列國通史；五、通史：中國通史；六、斷代史：明史、清史、太平天國史；七、制度史：民國通典、民國會典。朱希祖，〈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二〉，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98-99。

¹¹⁸ 朱希祖，〈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二〉，收入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輯，《史館論議》，頁92-94。

¹¹⁹ 朱希祖著有《中國史學通論》一書，對中國史學之起源，編年史、正史、記事本末等派別，以及漢唐宋起居注等均有論及。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臺北：莊嚴出版社，1977年）。

國家和學術體制的方向轉化。朱、但二人都是從傳統的修史制度或史學體例出發，但很多看法大相逕庭，也反映了新舊之間的轉換，仍存在不少見仁見智的問題。事實上，隨著朱氏卸下總幹事職務後，由但燾接任，根據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改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為國史院」提案，在「國史院組織條例草案」中，除以國史院直隸國民政府以外，大致沿襲但氏的構想。¹²⁰ 只是，依1946年通過公布之「國史館組織條例」，不僅國史院未設，除國史館仍直隸國民政府之外，其餘上述屬但氏之構想者，亦未實現。¹²¹ 顯示史館制度如何在民國以後運作仍有不小的變動性。

（二）籌劃檔案館

由於中國前此並無真正類似歐美檔案館的存在，故當朱希祖把檔案庫之籌劃納入籌委會的工作之後，該項工作可謂邁開了第一步。

1940年7月19日，朱希祖在日記中記曰：「讀胡適之復溥泉（張繼）信，並附寄美國中央檔案館章程報告等四冊，即付張聖奘翻譯。」¹²² 後來改由傅振倫翻譯，¹²³ 先譯出〈美國中央檔案館概述〉、〈中央檔案館對政府如何服務〉、〈中央檔案館館立檔案使用之規則〉等。之後又譯有〈德奧瑞檔案館考察報告〉、〈美國中央檔案館中檔案之修整及保藏〉、〈歐洲檔案之編制〉、〈普魯士檔案學教育之養成〉、〈柏林普魯士史學專科及檔案學學院規程〉、〈普魯士國家檔案館檔案學術服務人員錄用法〉等技術報告。¹²⁴ 足見籌委會一開始就很積極地吸收歐美檔案館的經驗和做法。

在相關的法規方面，1941年3月29日，張繼等人於中國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

¹²⁰ 如擬編纂實錄，又擬別開專館，撰寫民國通禮、民國通典等；還有清史、後明史、太平天國史、中國通史等皆開專館編修；並依循大著作、著作、著作佐、著士的取才標準。見「行政院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46年9月27日），〈國史館沿革史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14-000101-0085。

¹²¹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41-142。

¹²²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06。

¹²³ 傅振倫，〈六十年檔案工作憶往〉，收入氏著，《傅振倫文錄類選》，頁407。

¹²⁴ 〈五屆八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1年3月）、〈五屆九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1年10月），《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分別為：會5.2/171.13、會5.2/176.1。

上提案，以「既為國史由政府官修，當以政府官文書為主要根據，……。其蘊藏最富、功用最鉅者，厥為檔案。凡國家要政，對內對外，自中央以達各省縣市原委本末大備於是，尤史料之淵藪，會中所必收。……所據亦祇為共見共聞之一般圖書，私家皆能纂述，非國家開館官脩之意也」，擬請國府通令所屬以廢存檔案移交籌委會保存，並訂有辦法。¹²⁵ 同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正式頒行「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規定各機關檔案目錄要定期彙送至籌委會，無須保存之檔案也要造具清冊送該會查核，¹²⁶ 使其幾乎成了中央檔案主管機關。¹²⁷ 此外，為了嚴密檔案管理，該會還擬訂有「全國檔案館組織條例」、「全國檔案監理會組織條例」、「檔案保存辦法」以及「檔案處理實施辦法」等。¹²⁸

在籌委會相關檔案館規劃和檔案管理制度上，用力甚深者，當屬由朱希祖引薦的傅振倫。傅氏除譯有有關歐美檔案館制度的文章之外，亦在朱氏的囑咐下草擬「全國檔案館組織條例」。¹²⁹ 至其1946年離開籌委會後則著有《公文檔案管理法》一書，其中論及檔案館之組織；檔案管理上的點收、分類、編號、立卷等程序；還有檔案館之建置和檔案之修整保藏等。¹³⁰

朱希祖雖未親身執行檔案館之籌劃，但其建立檔案庫之理想，可謂在籌委會得到了初步的實踐，依該會之規劃，甚至有成為檔案主管機關之勢。而且從傅振

¹²⁵ 「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41年4月30日），〈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2070-00007-001。

¹²⁶ 「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規定，自該辦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將全部檔案造具有錄由之登記目錄一份，送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備查，以後新歸檔案卷，每半年造送目錄一份。辦法內容詳見「國民政府訓令」（1941年10月25日），〈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2070-00007-011。

¹²⁷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頁194-195。此一「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甚至到政府遷臺後仍沿用。1973年3月5日，行政院秘書處函所屬各機關：大陸運臺舊檔案及在臺已失時效案卷、文牘，移送國史館珍藏，其中即抄送有國民政府訓令及「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見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頁298-299。

¹²⁸ 〈五屆十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2年10月），《會議紀錄》，館藏號：會5.2/182.3。

¹²⁹ 傅振倫，〈朱希祖先生傳〉，收入氏著，《傅振倫文錄類選》，頁611。

¹³⁰ 傅振倫所著《公文檔案管理法》，收入傅振倫、龍兆佛著，《公文檔案管理法》（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頁2-81。傅氏所擬「全國檔案館組織條例」亦收於書中。

倫身上，也可以體現籌委會在推動檔案庫建置的成果。另一方面，當檔案徵集成為史館的職能，表示此時所謂官方修史，著重的是政府機關檔案的保存，以及利用官方檔案寫史。

二、採訪工作

籌委會成立之際，即負有徵集國史史料的任務，而史料的採訪和累積亦是該會立足最重要的基礎。

在朱希祖於1940年所撰寫之〈國史館籌備會二月至五月報告書〉中，曾指出調查檔案、採訪工作為該會中心工作，亦為至難的工作。蓋過去檔案因遷都不免散佚；現在檔案則因抗戰而必須保密，且因空襲之故，各機關檔案大都疏散至鄉間；其他史料散在北平、南京、廣州等處，均為淪陷區，一時難以羅致，但歷史全恃史料而成，非可向壁虛造，仍擬請各機關，以及各圖書館、各學校、各報館，協力匡助，並求私人捐借。¹³¹朱氏深知史料的重要性，但在戰時要進行蒐集則有一定的難度。

1940年4月16日，朱希祖、張繼、金毓黻首先至軍令部拜訪戰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張華輔，接洽採訪史料，該會允將可發表者隨時供給。¹³²同年5月9日，籌委會呈請國民政府，以其奉令籌備修史，擬從徵訪史料入手，並定徵訪範圍暫以民國成立以來為限，各機關如遇該會派員前往調查檔案時，務予極端便利。¹³³所以，該會一開始就是採取主動的態度，且目標明確以民國以來的檔案史料為限。

1941年4月，籌委會制定出「徵集史料簡則」，首先界定史料的範圍：時間上起清同治下迄當代；人物以中華民族為限，但外族人有直接影響中華民族者亦在徵集之列；地域為中華民國疆土，但記載海外僑胞者亦在徵集之列等。其次列舉史料的類別，包括：（一）政府機關之文書；（二）公私團體之記載；（三）

¹³¹ 〈五屆七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0年6月），《會議紀錄》，館藏號：會5.2/52.25。

¹³²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69、1172。

¹³³ 「籌委會呈國民政府」（1940年5月6日）、「國民政府訓令」（1940年5月9日），〈國史館沿革史（三）〉，《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3-017。

私人之撰述；（四）地志；（五）其他刊物。再次是徵集的方法，除向各機關團體實地採訪，函商各機關團體或個人贈送出版物外，還有延詣黨國勳賢及諳熟掌故之時彥演講或派員前往訪問錄存參考等。¹³⁴此一簡則對於該會所欲徵集史料的範圍和種類界定可謂相當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徵集的方式也包括人物訪問錄存，即類似現代所謂的口述歷史。後來，該會還發展出多種史料徵集的方式，包括：（一）派員訪購；（二）登報徵求；（三）通函徵集：分函中央與地方黨政機關並文化、教育、社會團體或私人，附寄徵求史料簡則，徵集出版刊物及其他史料；（四）派員抄寫；（五）商洽借閱；（六）私人徵求：該會工作人員皆兼負徵求義務，一方面分函各親友輾轉訪求，一方面以所見所聞報告採訪員。¹³⁵故徵集的方式頗為全面且多元，並極具積極性。

在採訪成果上，初期所得主要是各機關已公布印行的書籍、公報、工作報告，還有已出版的報刊、雜誌等。如至1941年3月為止，採訪到的史料有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公報》及《非常大總統時期公報》、《武漢政府公報》、行政院民國二十六、七、八年工作報告、戰史編纂委員會所編《盧溝橋軍事作戰經過》、軍事委員會所編《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等。¹³⁶到1941年10月，由於所得寄贈之公報刊物及蒐購之圖書史料增加數倍，開始成立圖書室編目備閱。¹³⁷相對於公報、圖書等出版品的採集工作較容易著手，可以在一開始就進行，政府檔案的移轉則至後期才逐漸有一點成績。¹³⁸如1942年開始接收各省市存廢檔案；1943年接收來自行政院的檔案；1944年接收貴州省政府、財政部、四川各地方法

¹³⁴ 「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函國民政府文官處」（1941年4月30日），〈國史館沿革史（三）〉，《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3-019。

¹³⁵ 〈五屆九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1年10月），《會議紀錄》，館藏號：會5.2/176.1。

¹³⁶ 〈五屆八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1年3月），《會議紀錄》，館藏號：會5.2/171.13。

¹³⁷ 〈五屆九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1年10月），《會議紀錄》，館藏號：會5.2/176.1。

¹³⁸ 針對「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的規定，如國民政府文官處就表示，以國民政府成立16年期間之案卷要在六個月內完成摘由並造送目錄，非其現有人力所能辦到。見「國民政府文官處函籌委會」（1941年12月11日），〈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2070-00007-012。

院、軍政部的檔案，之後則有更多機關陸續將檔案移送。¹³⁹ 算是為政府機關檔案的移轉開了先河，檔案庫的籌備也確實有了一些實質的成果。

三、編輯工作

籌委會成立伊始，朱希祖即擬編纂《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以下簡稱《民國史料長編》），以為修史資料，並規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為民國元年至國民政府成立；第二期自國民政府成立至抗戰開始；第三期為抗戰時期。¹⁴⁰ 為了進行這項工作，他曾撰〈國史長編釋例書名字職位例〉、〈國史長編釋例記年月日時例〉，也召集張聖奘及蔣逸雪、傅振倫、李菊田、朱煥堯討論《民國史料長編》各項寫法，並講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釋例》殘文及〈與范祖禹書〉，¹⁴¹ 顯示朱希祖對傳統的做法仍有所參酌。

《民國史料長編》由朱希祖起頭開始進行後，就持續到籌委會結束。即便朱氏卸下總幹事職務後，仍勸蔣逸雪、傅振倫、朱煥堯、李菊田繼續編輯。¹⁴² 此書採編年體，以事繫日，史料主要取材自官書報誌和私人著述。不過因為資料不足，整體而言並不完備，且在有限的時間下，雖一再校補，仍有疏漏舛誤之處。¹⁴³ 全稿後經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理，籌委會共完成1911年起到1946年7月為止之編纂，計540冊，惟散亂和殘缺情況確實相當嚴重。¹⁴⁴

其次，對籌委會被賦予的《清史稿》糾謬工作，朱希祖曾指出，糾正《清史稿》本不在國史館籌備範圍之內，今既奉令，僅宜以有悖國體政體者為限。¹⁴⁵ 事

¹³⁹ 「籌委會呈籌委會結束報告書」（1947年3月14日），〈國史館沿革史（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4-001。

¹⁴⁰ 〈五屆七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1940年6月），《會議紀錄》，館藏號：會5.2/52.25。

¹⁴¹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04、1206。

¹⁴²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40。

¹⁴³ 「籌委會呈籌委會結束報告書」（1947年3月14日），〈國史館沿革史（四）〉，《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4-001。

¹⁴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

¹⁴⁵ 許師慎編纂，《國史紀要（初稿）》，頁123。

實上，從中國修史傳統來說，新朝修前朝之史，是單獨設館，故民初有清史館與國史館並設的情形，¹⁴⁶ 清史由清史館修撰，非國史館職權。且朱氏本身還曾在1914年被聘為清史館協修，參與編修《清史稿》，¹⁴⁷ 深知其事。1928年，當他被推舉為故宮博物院審查清史稿委員會主任時，即主張發行，只是要略事審查不妥及重要遺漏之處，「以塞不欲發行者之口」，¹⁴⁸ 並表示：「側聞《清史稿》之禁，雖因其載筆不慎，微有觸犯，然略加修改，何至泯棄全功？」¹⁴⁹ 因此，他本不認為籌委會應從事《清史稿》的糾謬，亦不認同政府查禁的政策，所以對於此項業務比較消極。不過，仍請人催取《清史稿》，準備進行，並指導朱煥堯摘錄〈德宗本紀〉、〈宣統皇帝本紀〉中書法之謬者數十條。¹⁵⁰ 由此可知，該會作為政府組織之一，無法避免政治性任務，朱希祖從學術的立場出發，只好勉為妥協。

另外，由於朱希祖曾呼籲落實「宣付國史館立傳」，籌委會促成之因亦係取代黨史會負責蒐集受褒揚人物事蹟，故該會也在成立後，發函國民政府文官處，以忠貞義烈之文武官吏，其事蹟皆為紀傳之重要史料，請將歷來明令褒揚及宣付史館立傳人員之名錄其事蹟列冊送會。¹⁵¹ 之後，國民政府乃將褒揚錄令、行述等函達籌委會成為定例。該會後來也發展出「國史擬傳」體例，在其「編撰國史擬傳計畫草案」中，規定立傳對象包括國民政府令國史館立傳者和品學事蹟可備立傳者兩類，以及史料徵集程序。¹⁵² 至1942年10月，在該會出版的刊物《史蠡》上，已可見張自忠（1891-1940）、張謇（1853-1926）和朱慶瀾（1874-1941）擬傳。¹⁵³ 籌委會出身的傅振倫並於1945年出版了《民族抗戰英雄傳》一書，以

¹⁴⁶ 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臺北：國史館，1979年），頁121。

¹⁴⁷ 王愛衛，《朱希祖史學研究》，頁105-106。

¹⁴⁸ 朱元曙、朱樂川，《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頁276-277、311。

¹⁴⁹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鄭亭詩稿》，頁301。

¹⁵⁰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179、1183、1199。

¹⁵¹ 「籌委會函國民政府」（1940年6月1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222-00002-035。

¹⁵² 轉引自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頁17。

¹⁵³ 邢仲采，〈張自忠擬傳〉，收入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編，《史蠡》，頁99-101；蔣逸雪，〈張謇擬傳〉，《史蠡》，頁101-103；邢仲采，〈朱慶瀾擬傳〉，《史蠡》，頁103-104。

抗戰當中為國犧牲者的行事，按陸、海、空軍三大類，撰為列傳。¹⁵⁴ 相對於九一八事變之後，大量問世的以「民族英雄」故事為主題的各種專門讀物，主要都是歷史上所出現的「民族英雄」，¹⁵⁵ 傅振倫較為關注的則是抗戰當中的「民族英雄」，無疑更加肯定了當下的犧牲者。可以說，籌委會之藉由蒐集褒揚人物事蹟，並擬為之立傳，不僅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亦為戰時國家塑造的一環。

四、工作之難處

1940年8月12日，朱希祖撰〈增進效率三原則〉，諫張繼「用人不擇才，祇徇情面，又不給人以權，動輒掣肘，而大權反旁落；用財祇知節省不知發展事業，以致史館頗難奏績」。隔日，與館中同仁談館事時，即「頗有退志也」。¹⁵⁶ 可知，籌委會的人事問題開始讓朱希祖萌生退意。10月4日，他與張聖奘、朱煥堯、李菊田及張繼暢談該會之事，約定以後用人專用史學專家。¹⁵⁷ 其念茲在茲的一直是用人問題，尤以強調要用專業的史家。

1940年11月11日，朱希祖首次向張繼請辭總幹事，雖得挽留，但仍三度堅辭。¹⁵⁸ 堅辭的原因在給女兒朱倓的信中透露：「以事業言，固不宜捨置；以人事言，實早應離開。以彼輩敗壞事業則有餘，襄成事業決不能，徒然使余日受惱耳。」又在給女婿羅香林的信中謂：「國史館事大失所望，造成一支乾薪送人情營私利之局面，故急擬辭去要職。」之後，他又第四度上辭呈，在給朱倓的信上則提到：「總幹事及顧問所得辦公費相差不過五十元，宜張主任不肯允改也，可見待遇不公，勞役又相差太遠，何以能服人心？辦事又荒謬絕倫，使我精神不快。」¹⁵⁹ 朱希祖對張繼的人事安排不滿，特別是用人不能擇才，造成人情營私的

¹⁵⁴ 傅振倫，〈民族抗戰英雄傳序言〉，收入氏著，《民族抗戰英雄傳（第一集）》（重慶：青年出版社，1945年），頁1-2。

¹⁵⁵ 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概念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頁320-338。

¹⁵⁶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13。

¹⁵⁷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28。

¹⁵⁸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下冊，頁1230-1232、1238。

¹⁵⁹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鄭亭詩稿》，頁239-241。

局面，應是其堅辭總幹事一職的重要原因。當然，從張繼的立場來說，可能並不這麼認為。¹⁶⁰但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表示，朱氏身為學者，與張氏身為從政者，在用人標準上有不同的思考，甚至對機關定位的認知有所差距。

從朱希祖對史館制度與修史體例的設計可知，他並不守舊，而且欲使此一具有濃厚傳統色彩的機關能適應新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不過他與但燾在若干看法上的歧異，卻也顯示史館制度在新時代中存在見仁見智的問題。至於他所提出建立檔案總庫、徵集史料、落實「宣付國史館立傳」等想法，則得到了若干程度的實現。只是，籌委會處在學與政之間，面對如糾謬《清史稿》之類的政治性工作，不得不有所妥協，又他與張繼可能從不同的思考角度出發，尤其對史館人才的標準不同，終使其不得不掛冠求去。

伍、結語

1939年初，朱希祖因與張繼相識的關係，得以提出建立檔案庫與籌備國史館的構想。該文一方面呼應時代，特別是中日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之際，需要藉由國史進行精神上的動員與武裝，以持續對日作戰。另一方面，亦符合當時學界在西方史學影響下，強調利用原始史料、重視檔案保存的觀念，以及設立國家檔案庫的呼聲。

1939年底，當黨史會以蒐集褒揚人物事蹟為由，欲轉型成國史史料機關時，戰時的情況已讓黨史不再能取代國史，但朱希祖的想法卻得到實踐的機會，而有了籌委會的成立。值此之際，傳統帝制下的史館，不僅披上了近代國家的外衣，亦走出黨史的束縛，成為戰時國家塑造的一環。由於籌委會主任委員張繼的邀請，朱希祖出任總幹事。在其規劃下，籌備檔案庫成為該會工作的一部分，此外，積極引進在大學史學系任教或受過大學史學系專業訓練的人才，也讓該會得

¹⁶⁰ 據張繼推薦進入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的黃穉荃（1908-1993）回憶，張繼待人用人，一秉至公，善惡邪正是非之辨，絲毫不相假借。見黃穉荃，《杜鄰存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73。

以和現代學術體制接軌。

在籌委會正式運作後，透過法規命令，無論是蒐集褒揚人物事蹟或是檔案徵集工作，都成了國家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類似西方國家檔案館的角色。在史館制度與修史體例的籌劃上，朱希祖敏感地體認到應符合政治體制及時代環境；在人才的培養方面，則堅持要具有一定的專業性與學術性。然而，可能由於與張繼出身背景的差異，導致在用人標準上的看法有所不同，終使朱氏感到失望，掛冠而去。

回顧籌委會從成立到運作，可以知道，進入民國以後，傳統帝制時代的史館組織能新的政治及學術環境下存在，其實已經過一番「近代國家化」的過程及新史學的洗禮，史館的性質已與古代有所不同，從其名稱來看，雖然是支舊瓶但事實上已裝了不少新酒，其中，朱希祖在這個階段對史館制度的籌劃，發揮了一定推動轉型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共和體制下，時人亦已認知，不可能有「國定」、「官定」之類具有權威性質的官修史書，一如《清史稿》只能永遠是「稿」，不可能再有所謂「正史」的出現，¹⁶¹ 而檔案館和史館的結合，更使得「官修」之意充其量只能是利用官方檔案資料所寫出來的歷史。

¹⁶¹ Hsy-yuan Chen (陳熙遠), "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 2:2 (Nov. 2004), pp. 198-199.

徵引書目

一、檔案

《行政院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國史館沿革史案〉。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國史館沿革史（一）〉。

〈國史館沿革史（二）〉。

〈國史館沿革史（三）〉。

〈國史館沿革史（四）〉。

〈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速記錄（十五）〉。

《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五屆七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

〈五屆八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

〈五屆九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

〈五屆十中全會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

二、史料彙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三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陳鵬仁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上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

三、日記、文集、回憶錄、訪談錄、年譜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臺北：著者自印，2000年。

朱元曙、朱樂川，《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上、中、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酈亭詩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倬輯，《史館論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

朱偁，《天風海濤樓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沈懷玉、游鑑明訪問，周維朋記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編，《史蠡》。重慶：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42年。

傅振倫，〈遊英法檔案館小記〉，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會編輯，《文獻論叢·論述二》。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年。

傅振倫，《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

傅振倫，《蒲梢滄桑一九十憶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黃穉荃，《杜鄰存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滕固著，沈寧編，《被遺忘的存在：滕固文存》。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二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年。

四、公報、雜誌

《文獻特刊》，北平，1935年。

《東方雜誌》，上海，1904年。

《國民政府公報》，南京，1937年。

《獨立評論》，北平，1935年。

五、專書

-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增訂初版。
- 王愛衛，《朱希祖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平野聰著，林琪楨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臺北：八旗文化，2018年。
- 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臺北：莊嚴出版社，1977年。
- 何魯成，《檔案管理與整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北：國史館，2019年。
- 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臺北：國史館，1979年。
- 許師慎編纂，《國史館紀要（初稿）》。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年。
-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
- 傅振倫，《民族抗戰英雄傳（第一集）》。重慶：青年出版社，1945年。
- 傅振倫、龍兆佛著，《公文檔案管理法》。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
- 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概念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 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建立六十週年紀念》。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年。
-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 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六、論文

- 但燾，〈修史雜議〉，《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3號（1948年8月）。

- 李淑珍，〈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的創造與轉化〉，《新史學》，第19卷第2期（2008年6月）。
- 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收入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
-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 周文玖，〈朱希祖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4期（2013年12月）。
- 周佳榮，〈朱希祖與北京大學史學系〉，收入李金強等著，《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林滿紅，〈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 張世瑛，〈國民政府對抗戰忠烈事蹟的調查與紀念〉，《國史館館刊》，第26期（2010年12月）。
- 勞榦，〈論今後的國史〉，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年。
- 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期（1997年）。
- 葛兆光，〈《新史學》之後—1929年的中國歷史學界〉，《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2003年2月）。
- 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2月）。
- 蔡炯昊，〈新國體下的舊史學—民國初年的宣付清史館立傳（1914-1927）〉，《學術月刊》，2017年第10期（2017年10月）。
- Chen, Hsy-yuan（陳熙遠），“Last Chapter Unfinished：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 2:2(Nov. 2004).